

开创近代史研究的新体系 在党校教学中

胡绳与中央党校
□ 严建萍



一门讲授中国通史的课程。胡绳自告奋勇开设了中国近代史。为便于讲授，他编写了《中国近代史提纲（1840—1919）》。这本4万多字的提纲，由马列学院印成小册子，成为党校历史教研室最早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为满足教学需要，1960年和1962年又对这个提纲进行了修订，这些教材传到校外，产生较大影响。

胡绳讲授中国近代史这门课，一星期讲一次，共讲了两个学期。他的课特点鲜明。有一位当年的学员回忆说，那时候，最受欢迎的首数胡绳同志讲的课。他不是演说家，声音既不洪亮，辞藻亦少修饰，既不肯故作壮声大语，更不讲究抑扬顿挫；听他讲课，简直像是在听一位长者慢声细语地叙说家常。但在他的娓娓叙述下，不知不觉进入了一片新颖而充满生机的开闢境界。他不是简单地向人们灌输知识或者宣布判断和结论，而是耐心地解剖历史事实，细致地展示他在作出判断和结论之前，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独立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

另一位学员追忆说，胡绳的讲课之所以吸引人，不仅因他掌握了准确而丰富的资料，而且重要的是紧密结合时代的需要，联系历史实际和学员的思想实际，进行各种深入的分析，结论让学员思考和讨论。他对学员是亲切的平等的，从不居高临下，不搞教训人的一言堂。即使有不对的意见，也是启发学员自己讨论解决，目的就是让学员逐步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重视说理，娓娓道来，胡绳讲课是这样，写文章也是这样。他的文章说理性强，表现在对人和事总是作具体分析，说得比较周全，不简单地和绝对化，就是写批评文章也是心平气和，不是盛气凌人。

形成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特色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增强的民族自豪感，使得追溯近代以来人民革命斗争历程、构建革命谱系、论证新政权的历史合法性，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因此，从近代中国内部寻求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逐渐成为包括胡绳在内的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倾向和理论自觉。他的《中国近代史提纲（1840—1919）》以及1954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就是这种努力的集中体现。

他在书中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通过分析1840至1919年间各种社会阶级力量的发展和变化，他将“三次革命高潮”归纳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三次革命高潮”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准，他将1919年前的中国近代历史细分为“七个时期”。“三次革命高潮”提出后，引起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一场激烈讨论。经过讨论，胡绳构建的近代史解释体系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三次革命高潮”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中提纲挈领的核心概念及基本标志，由此构建了近代史宏观架构，被教学大纲采纳并在

教科书中加以贯彻。此后，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逐渐定型，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思维方式与研究课题的选择均产生覆盖性影响。

有了对“三次革命高潮”和“七个时期”的认识，胡绳开始按照这种看法写出一本书来。这本书，就是二十多年之后完成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由此，《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提纲（1840—1919）》《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以及他在上世纪40年代末写成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特色体系，对这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主持编写第一部全国通用哲学教科书

胡绳还有一项不大为人所知的学术成就——负责组织和参与编写新中国第一部全国通用哲学教科书，即由艾思奇署名主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编写的供全国高等院校和各级党校使用的哲学教科书，邓小平指定由胡绳负责。它改变了此前我国哲学教学主要采用苏联教科书的状况，深受广大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欢迎，中国哲学界公认其“是当时国内最高水平”。

这部哲学教科书1959年才开始编写，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此之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哲学和经济学的教学，深受苏联影响，在党校系统尤其如此。当时的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成立时间不长，还不能写出自成体系的讲义和教科书，用的都是苏联专家的讲义和教科书。随着中苏两国关系不断恶化，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也就不能再继续使用，编写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迫在眉睫。

1959年10月，中央下达了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任务，由中宣部组织协调，中央理论小组负责具体组织工作，胡绳是中央理论小组副组长。中央理论小组组织中央高级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六所高校编写六本哲学教科书。1960年2月，书稿全部收齐。4月24日，在中央高级党校礼堂召开审稿座谈会，胡绳在会上发言。会议认为六本书各有特点，要把六本书的优点集中起来编一本，确定以党校本为基础，但这需要组织人重写。1960年夏秋，中央理论小组做出调整，教科书由胡绳、艾思奇共同主持和组织编写。新组成的编写组成员以中央高级党校教师为主，党校除艾思奇外，还有韩树英等8位同志，此外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也都有同志参与。

胡绳自始至终参加编写工作，拟出写作大纲，并提出四条编写原则：一是教科书应具有相对稳定性；二是要求比较准确、简练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并论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三是明确教科书的对象；四是贯彻百家争鸣原则。这四条原则，充分遵循教科书的编写规律，把握了教科书特征，保证了教科书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具体编写时，胡绳从头至尾参加了集体讨论和修改，讨论时胡绳一段一段念，一段一段议，对每句话都做推敲，边读边议，逐章通过。历时9个月，教科书初稿才完成。1961年夏，胡绳主持召开终审定稿会。按照安排，稿子要集体讨论，逐段通读，没有意见就通过，小的文字上的提法问题当场敲定，个别段落需要重写的拿出来修改再讨论。整整花了半个月才完成审稿工作。审稿结束后，在一次会上上讨论署名问题，胡绳说自己不是专门搞哲学的，编写这本书党校教师是主力，主编就是艾思奇一人，不要挂他的名。如果要提到他，就说他参加了顾问性质的工作，就这样定了。（下转4版）

守正创新 走向未来

——文史学科的发展历程

□ 张 军

庆祝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

学科史话——文史学科

在中央党校成立至今90年历程中，文学与历史学可位于历史最为悠久的学科之列。自建校以来，中央党校就高度重视语言文学和历史的教学与科研。抚今追昔，党校文史学科伴随着时代变迁，筚路蓝缕且守正创新，始终在党校的教学与科研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奠定发展基础

1933年3月13日，中央党校的前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创办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从创办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停办，存续了一年半时间。当时，党校教学分设不同班次，学习科目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党的建设与苏维埃的建设、工人运动、语文、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常识，等等。著名文学家成仿吾和冯雪峰当时是党校专职教员，教学任务的重点是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适应当时革命和战争需要，培养胜任党团政府工会等苏维埃工作的干部。

1935年11月，中央党校在延安复校。从复校到1947年3月撤离延安，历时11年多。这一时期，中央党校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开设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革命史等重要历史课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亲自为学员授课，一时蔚为壮观。

1938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延安马列学院成立。1941年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下设中国历史研究室。1942年中央研究院制定了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三年计划，计划中有详细的历史各门类的分类研究。1943年4月，中央研究院并入党校，成为中央党校第三部。由此，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方面的相关人员和研究团队即正式并入中央党校，中央党校的历史教研力量得到极大补充提升。

鉴于当时一些革命干部知识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语文、历史教育在干部培训中显得尤为重要。1936年，中央党校先后迁往陕北保安、定边，此时普通班的学员“一边识字，一边学习革命理论。每天一堂文化课，一堂政治课，隔一天一堂军事课，有时还学点历史、地理”。当时陕北苏区正在推广新文字（即拼音文字），中央党校也开始教学新文字。据1937年间在中央党校工作的文化教员回忆，中央党校在桥儿沟时期，党校的一、二、三班学员，除了学习文化课，如识字等以外，还要学习政治课。有的文化教员，还专门给长征过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当文化教员，教他们读汉字、唱歌。这个时期，成仿吾还亲自教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学员学习汉语发音。

语言文字等课程受到党的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2年1月17日，毛泽东为何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人编写的《文化课本》作序，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对干部读书写作等文化能力的培养逐步成为党校教学的重要内容。

在延安时期，整风运动对中央

党校的语文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1942年2月1日、8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和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在全党引起热烈反响，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由此，整顿文风也成为党校语文教学的中心内容。中央党校在语文教学中重视写作的教学传统由此形成。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规化建设起步

1948年7月，在全国胜利即将到来之际，党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刘少奇任院长。1955年马列学院正式改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高级党校）。这段时期的党校，机构和制度逐渐建立健全，教学力量增强，办学规模逐步扩大。根据当时形势需要，分设长学制的理论班、短学制的轮训普通班、高级研究班、师资班、民族班，以及补习文化知识的文化班等等，但主要以理论教育为主，历史和文学教育分列其中。

1953年5月23日，马列学院提交了《关于马列学院的教学任务、教学方针、组织机构、组织领导及党务工作向毛主席并中央的报告》。其中，编制上设置八个教研室，包含语文教研室和历史教研室。各教研室的工作任务是按照教学计划，编写教授提纲，讲授课程，辅导理论学习。在教学体系中，文学教学受到特别重视，是予以加强的。据学员回忆，当时的语文课，主要是写文章；然后由老师批改，指出问题在哪里，好处在哪里。学员兴趣高，教学效果明显。著名文学家何其芳、周文、何家槐都曾在这个时期的语文教研室任教。

对于历史教学，中央领导一直给予高度重视。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学习世界史的要求：“有人提出为什么要学西方史？不学行不行？不学不行。因为学西方历史是为了读懂马列主义。毛主席说，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习理论，就是为了使这一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我们要既有实际经验，更要有理论知识，二者缺一不可。既要有中国经验，又要有外国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是跛足的是马克思主义者，而经验主义者则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得不远，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普遍真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有中国经验，又有外国经验，才有实现正确指导的可能。”1953年之后，党校的教学方针确定为“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1956年又修改为“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据此，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要求，历史课应通过讲历史来总结经验教训，从而间接地指导实际工作。其功能在于为学员学习理论和党的政策路线打下良好的基础。教师应向学员讲授一些主要的历史规律和经验，而不是全部的历史细节。历史教研室研究决定，世界史教学的具体任务是辅助学员学习经典著作和基本理论，讲授重点是经典著作、理论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重大事件和其他近代重大革命运动。中国史的具体任务则是为学

员学习中共党史打好基础，为学习中央政策路线以及毛泽东著作创造条件。这也基本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党校历史教学的方向和基调。

总之，自语文和历史两个教研室成立后，中央党校的语文和历史教学进入了体系化、常态化的阶段，有了明确定位和要求，有计划地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虽然这一时期，师资力量不够强，授课对外请专家依赖程度较大，但两个教研室的教师还是尽己所能进行了很多教学和相关组织辅导工作，编写了大量讲稿和文献资料。直到“文革”前，党校干部教育一直重视领导干部的文化水平提高和历史知识学习，不少文史大家都曾莅临党校授课，极一时之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发展与新气象

1977年3月，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以轮训高中级干部和培训中青年干部为主。复校之初，在校领导的关怀指导下，从事文史教学研究的同志编写了六本书，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态度》（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革命文风》（中央党校教材）、《中国古代政治人物传记选注》（上、中、下三册，河南人民出版社）、《古文选注》（中央党校教材）。以上六本书，为上世纪80年代党校文史教学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90年，为了适应学术研究和学科领域不断深化与细化的发展变化，中央党校进行了全校范围的机构调整。1991年3月，文史教研部正式成立，是第一批成立的7个教研部门之一，下设语文、历史等若干教研室，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体系，进行文学和历史等知识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1994年10月，中央党校按照全国党校工作会议要求，改革分学科的课程学习模式，探索“一个中心，四个结合”的教学体系，以专题课程的形式来组织教学。其后几经完善，在2000年确定了“一个中心，四个方面”的教学布局，后发展出“三基本”“五当代”的课程体系。理论教育不再简单按照学科组织实施。在党校教学体系发生深刻变化背景下，为顺应党校教学改革，回应改革开放后复杂多样的文化发展，秉持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的历史本色，深度阐发文学、历史中蕴含的价值、思想和理论意义的文化内涵，1996年4月，文史教研部在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社会主义文化教研室，这给文史教研部的教学科研带来了非常大的变革。

文化研究成为文史教研部教学科研工作的重点发展方向。文史学科不再囿于具体学科知识的讲授，而是不断向文化、文明史研究方向聚焦，回归文化本质性的理论宏旨和思想大义。教学工作率先实现突破性发展。开设的课程有“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中西文化比较及中西文化融合”“现代化进程的文化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文明”等等。这些课程在学员中引起较好反响。文史教研部教学进入党校主体班理论教育课程体系。另外，基于对文化研究在党的干部教育、文化变迁、社会转型中的历史地位及历史使命的深刻认知，文史教研部教师开始有意识调整科研工作方向，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为中心，辅以西方思想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科研布局逐步成型。

文史学科的学位点建设取得较大进展。2003年，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硕士点设立，次年开始招生。（下转4版）